

李貴生、梁慧敏 (2010)：香港工作場所中三語使用的初步調查，《中國語文研究》
2010 (1)，頁 97-110

香港工作場所中三語使用的初步調查*

李貴生 梁慧敏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

提要：本文旨在調查香港社會的實際語言使用情況，通過問卷調查搜查數據，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描述香港非工作和工作場合中，粵語、英語和普通話的使用概貌以及不同變項對這三門語言使用頻率的影響，藉此審視香港當下的語言政策，探討其中值得注意的現象和問題，進而闡明語言使用的社會調查是制定高效、合理語言政策的關鍵條件。

關鍵詞：香港、粵語、英語、普通話、語言調查

一 引言

「兩文三語」(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是香港既定的語文政策。為了推廣這項政策，政府過去一直在常規教育和在職進修等不同層面上投放大量資源，希望提高市民運用三語的能力。三語並重當然有現實的需要，因為粵語、英語和普通話三種口頭表達在香港社會各有特定的功能。可是在推廣的同時，我們也要知道，對普遍的社會大眾而言三語其實是頗高的要求，需要通過相當時間的訓練始能有一定的成效。因此要有效地運用資源，落實三語政策，我們應該對「香港實際的工作環境中市民最常使用的語言」這個問題有基本的認識，而非不分緩急輕重地同時發展三語的能力。

針對上述問題，本研究訪問了一千多位香港市民，調查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同處境下使用三語的頻度，藉此深化我們對香港實際語言環境的理解。以下我們會先簡介過去的相關統計數據以及本研究的調查設計，接著會從較為宏觀的角度概述工作場所中三語使用的情況，然後再把焦點集中在幾個影響工作場所的變項因素，最後則會從中探討值得注意的現象和問題。我們希望這些討論能為相關的政策部門提供一些參考資料，並且為更深入的調查奠下基礎。

* 本研究得到香港教育學院 IRG 研究項目「香港粵語的使用情況與語體特色之初步調查」(RG 43/2008-2009) 的資助，特此致謝。

二 調查的目的與方法

2.1 研究背景

香港過去一直有不同類型的語言使用調查，其中最定期和最有代表性的項目，當推香港政府統計處主持的「人口普查」(population census)。人口普查的規模十分龐大，每隔 10 年舉行一次，並會在兩次普查之間進行一次中期人口統計(population by-census)。這項調查會搜集香港人口及社會特徵方面的資料，包括五歲及以上人口的慣用語言。以下分別是一九九六年、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六年有關方面的數據（香港政府統計處 2006）：

表 1：香港政府統計處慣用語言

慣用語言	1996		2001		2006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廣州話	5 196 240	88.7	5 726 972	89.2	6 030 960	90.8
普通話	65 892	1.1	55 410	0.9	60 859	0.9
其他中國方言	340 222	5.8	352 562	5.5	289 027	4.4
英語	184 308	3.1	203 598	3.2	187 281	2.8
其他	73 879	1.3	79 197	1.2	72 217	1.1
總計	5 860 541	100.0	6 417 739	100.0	6 640 344	100.0

註：這些數字不包括失去語言能力的人士。

這些資料宏觀地勾勒出香港語言使用的基本面貌，讓我們對本地幾種慣用語言的使用人數及其所佔比例有一個概括的認識。可惜這類調查並沒有顧及不同情況下的語言使用問題，須知慣用一種語言不表示不會說另一種語言，譬如一個慣用廣州話的人在特定的場合也須使用英語或普通話交談。現在的人口普查，顯然未能提供這些方面的資料。

相比之下，由學者自發主持的研究項目雖然規模不及人口普查，不過由於調查重點較為清楚，因此他們收集的資料亦會較為詳盡和深入。早在 1977 年，鄒嘉彥已就香港中產階層的家庭用語進行調查（鄒、游 2007: 298-303）。這項研究的成果復見於他與游汝傑合撰的《社會語言學教程》內，產生頗為深遠的影響。前兩年《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5)》論及香港回歸後的語言狀況和語言政策時，便仍舊沿用他的觀點（《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課題組 2006）。然而這項調查畢竟是三十年前的項目，此後香港社會發生了許多轉變，我們若要準確掌握現況，實在有必要再做一番調查。

有見及此，本研究認真參考了過去的成果後，決定重新調查三語在香港的實際使用情況，希望能為相關的學術研究或政策討論提供較新的資料。

2.2 問卷設計

為探討香港社會實際的語言使用情況，以及增加研究資料的完整性，本研究於 2009 年 6 月至 8 月期間派員到新界、九龍和香港島各區，以隨意抽樣的方式訪問市

民，瞭解三語在他們日常生活的會話中到底各佔甚麼比重，最後順利完成 1,004 份有效問卷。

調查問卷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調查對象的一些背景資料，包括他們的母語、定居最久的城市、年齡、教育程度、職業類別，以及職位階層等。

第二部分主要針對工作場所與非工作場所的語言使用情況。非工作場所包括與家人交談、與友人閒談、外出購物、在公共場所用餐、收看或收聽電視劇、電視新聞或者收聽電台廣播、參與文娛康樂活動（如唱歌、看電影、舞臺劇、歌劇等）等場合下所使用的語言及其頻繁程度，而工作場所則包括與同級交談、與上級交談、與下級交談、與其他機構或企業進行業務上的交往、與工作服務對象交談、進行單位小組會議、在工作場所閒談，以及到政府機構辦事等場合下所使用的語言及其頻繁程度。頻繁程度以 0 至 5 分為評量標準，當中最常使用者為 5 分，較常使用者為 4 分，一般情況下使用者為 3 分，較不常使用者為 2 分，最不常使用者為 1 分，從不使用者則為 0 分。由於本文的重點是工作場所中語言使用的情況，因此非工作場所的資料只會作參考或比較之用。

第三部分涉及對粵語的語言態度問題，包括哪種語言最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粵語在香港的重要性、學習和掌握粵語的用處，以及希望自己的粵語能夠達到什麼程度等問題。選項亦按程度劃分，最高分為 5 分，表示非常重要，4 分表示較重要，3 分表示一般，2 分表示較不重要，1 分表示非常不重要，0 分表示根本不需要使用亦可。

三 調查結果概述

3.1 基本資料

本研究成功訪問了 1,004 人，以下是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教育和職級的分佈：

表 2：受訪者基本資料

資料項目		人次	百分比
性別	女	526	52.4%
	男	478	47.6%
年齡	18 歲以下	63	6.3%
	19-30 歲	533	53.1%
	31-40 歲	200	20%
	41-50 歲	146	14.5%
	50 歲以上	62	6.2%
教育	小學	23	2.3%
	中五	360	35.9%
	中七	135	13.4%
	大學	413	41.1%
	碩士	63	6.3%
博士或以上	8	0.8%	
職級	行政管理人員及高級行政人員	59	5.9%
	專業人士、輔助專業人士及中層管理人員	314	31.3%
	一般文職及技術工作	629	62.8%

參照香港統計處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的數據，本研究的男女比例尚算有代表性。然而由於本研究的重點與工作場所有關，尚未入職場的青少年及已退休的市民均未能成功完成整套問卷，因此在最後順利完成的問卷中，19 至 50 歲的受訪者幾乎佔九成之多，高於香港整體人口的比例；教育程序方面，中五至大學的人數亦達九成，同樣高於香港人口的比例。至於職業性質方面，除了行政管理人員的比例稍低於政府的 10.8% 外，其餘項目大體接近香港整體人口的比例。

3.2 工作場所與非工作場所的比較

瞭解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後，現在可以看看調查的初步統計。下圖是粵語、英語和普通話在非工作場合與工作場合總使用頻率的均值分佈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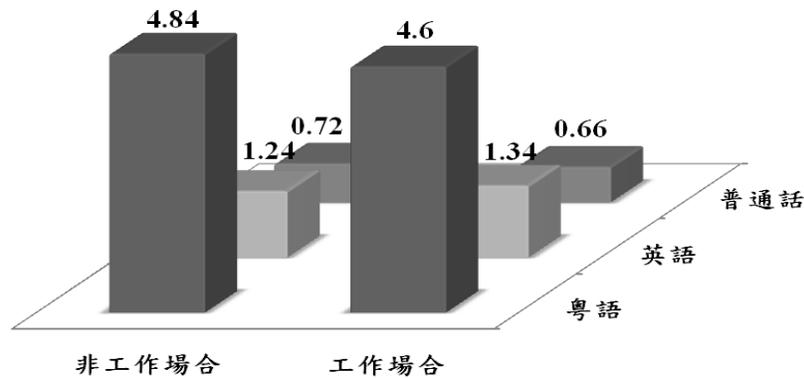


圖 1：三語在非工作場合與工作場合的均值

圖中顯示，粵語在非工作與工作場合中俱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語言，所得均值分別為 4.84 與 4.60，接近「最常使用」的程度；英語則佔第二位，二者的均值分別是 1.24 與 1.34，介乎「最不常使用」至「較不常使用」之間；普通話的均值更低，只有 0.72 與 0.66，介乎「從不使用」至「最不常使用」之間。

三語之中，粵語的均值遙遙領先於其餘兩種口種。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粵語與普通話在非工作場合的使用頻率，都較工作場合的均值為高，唯獨英語恰好相反，工作場合的均值高於非工作場合。這種差異正可說明，儘管英語的實際使用頻率與粵語有一段頗大的距離，但它在工作場合中的確有獨特功能，佔有特定的位置，即使在非工作場合中慣用粵語的人，亦有需要在工作場合中使用英語。

假如要進一步知道三語在非工作與工作場合中各種處境的使用情況，可參照以下的分項列表：

表 3：全樣本三語使用均值分佈

非工作場合		均值	工作場合		均值
與家人交談	粵語	4.90	與同級交談	粵語	4.73
	英語	0.57		英語	1.18
	普通話	0.39		普通話	0.57
與友人交談	粵語	4.93	與上級交談	粵語	4.53
	英語	0.99		英語	1.24
	普通話	0.59		普通話	0.37

購物用語	粵語	4.97	與下級交談	粵語	4.77
	英語	0.41		英語	0.66
	普通話	0.21		普通話	0.39
公共場所用餐	粵語	4.97	與業務對象交談	粵語	4.43
	英語	0.43		英語	1.72
	普通話	0.16		普通話	0.83
收看電視、 收聽廣播	粵語	4.79	與服務對象交談	粵語	4.61
	英語	2.49		英語	2.00
	普通話	1.44		普通話	1.43
文娛康樂活動	粵語	4.47	會議語言	粵語	4.53
	英語	2.53		英語	1.22
	普通話	1.54		普通話	0.37

從表中可見，粵語在與家人、友人交談，以及出外購物、用餐等場合的使用均值都有至少 4.90 分，反映受訪者在日常生活中慣常使用粵語。然而，他們在工作場合中兼用英語或普通話的情況亦頗為普遍，尤其在與服務及業務對象交談時，使用其他兩種語言的機會更是偏高。

要深入理解這些數據的意義，我們可以結合受訪者的基本資料，看看性別、年齡、教育和職級等變項因素對三語的使用到底有甚麼影響。

四 工作場所語言使用的變項比較

4.1 影響力較少的變項

本節採用社會科學統計程式（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軟體中的單因數變異數分析方法（One-Way ANOVA），通過比較不同的工作場合中語言使用的組內差異和組間差異的大小，來確定重要的影響因素。從數字著眼，當顯著性小於 0.05 時，表示影響因素均值上存在顯著差異；相反，當顯著性大於 0.05 時，即表示差異並不顯著（尹海潔、劉耳，2008；余民寧，2005）。

經過分析後，我們發現性別和年齡屬影響力較少的變項。二者的顯著性儘管在個別場合中或會少於 0.05，但細看當中的差異，並未足以構成有意義的推斷。例如年齡有以下四種場合的顯著性少於 0.05：

表 4：年齡對各變項的顯著性影響

		平方和	df	均方	F	顯著性
同儕普通話	組間	18.056	5	3.611	2.441	.033
	組內	1461.515	988	1.479		
下級粵語	組間	18.018	5	3.604	3.512	.004
	組內	812.629	792	1.026		
下級英語	組間	27.763	5	5.553	2.850	.015
	組內	1542.884	792	1.948		
服務對象英語	組間	47.109	5	9.422	2.609	.024
	組內	3412.874	945	3.612		

這四種場合的數據當然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然而深入再看，這些差異並未見得有特別的趨向（參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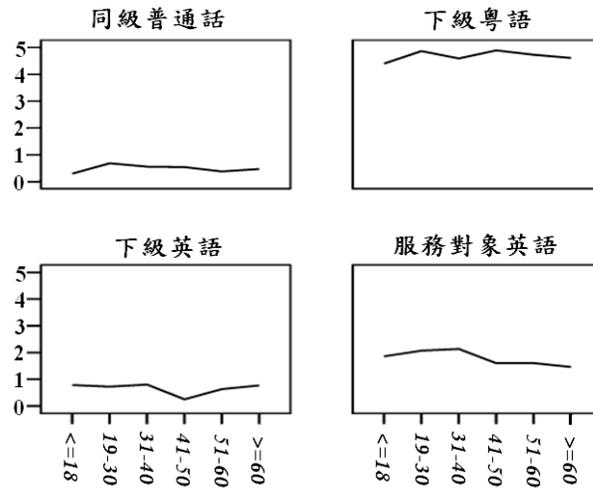


圖 2：受年齡影響顯著的變項

相較之下，教育程度和職業性質對工作場合中的三語使用，無疑有較明顯的影響，值得多作說明。

4.2 教育程度

我們的調查顯示，教育程度的高低對某些工作場所中的三語使用，帶有非常明顯的影響。這些場合包括：與同級交談、與上級交談、與下級交談、與其他機構或企業進行業務上的交往、與工作服務對象交談及進行單位小組會議等六種情況。以下是教育程度對各變項影響力的數據：

表 5：教育程度對各變項的顯著性影響

		平方和	df	均方	F	顯著性
同僚粵語	組間	129.158	5	25.832	26.072	.000
	組內	976.898	986	.991		
同僚英語	組間	335.742	5	67.148	24.591	.000
	組內	2692.386	986	2.731		
同僚普通話	組間	36.765	5	7.353	5.033	.000
	組內	1440.435	986	1.461		
上級粵語	組間	194.576	5	38.915	21.564	.000
	組內	1743.304	966	1.805		
上級英語	組間	360.531	5	72.106	23.003	.000
	組內	3028.094	966	3.135		
上級普通話*	組間	10.744	5	2.149	2.070	.067
	組內	1002.869	966	1.038		
下級粵語	組間	98.567	5	19.713	21.302	.000
	組內	732.025	791	.925		
下級英語	組間	109.689	5	21.938	11.969	.000
	組內	1449.799	791	1.833		
下級普通話	組間	21.991	5	4.398	3.781	.002
	組內	920.087	791	1.163		

業務粵語	組間	82.305	5	16.461	7.828	.000
	組內	1423.545	677	2.103		
業務英語	組間	344.061	5	68.812	20.025	.000
	組內	2326.402	677	3.436		
業務普通話	組間	49.701	5	9.940	4.607	.000
	組內	1460.565	677	2.157		
服務對象粵語	組間	156.324	5	31.265	22.709	.000
	組內	1298.283	943	1.377		
服務對象英語	組間	202.844	5	40.569	11.811	.000
	組內	3239.051	943	3.435		
服務對象普通話*	組間	31.708	5	6.342	2.093	.064
	組內	2857.158	943	3.030		
會議粵語	組間	190.047	5	38.009	21.713	.000
	組內	1533.499	876	1.751		
會議英語	組間	335.431	5	67.086	21.523	.000
	組內	2730.457	876	3.117		
會議普通話	組間	28.258	5	5.652	5.225	.000
	組內	947.507	876	1.082		

*：受教育程度因數影響的顯著性大於 0.05 者

這些項目的顯著性絕大部分接近 0，反映教育程度對這些場合的語言使用確有極大的影響。當中上級普通話和服務對象普通話的數值雖然均高於 0.05，但為了方便對照，我們仍然把它們列出來，以便參考。

當然，這些數據只能說明教育程度對某些項目有顯著性的影響，若要明瞭這些影響的實際情況，還得進一步參看下面的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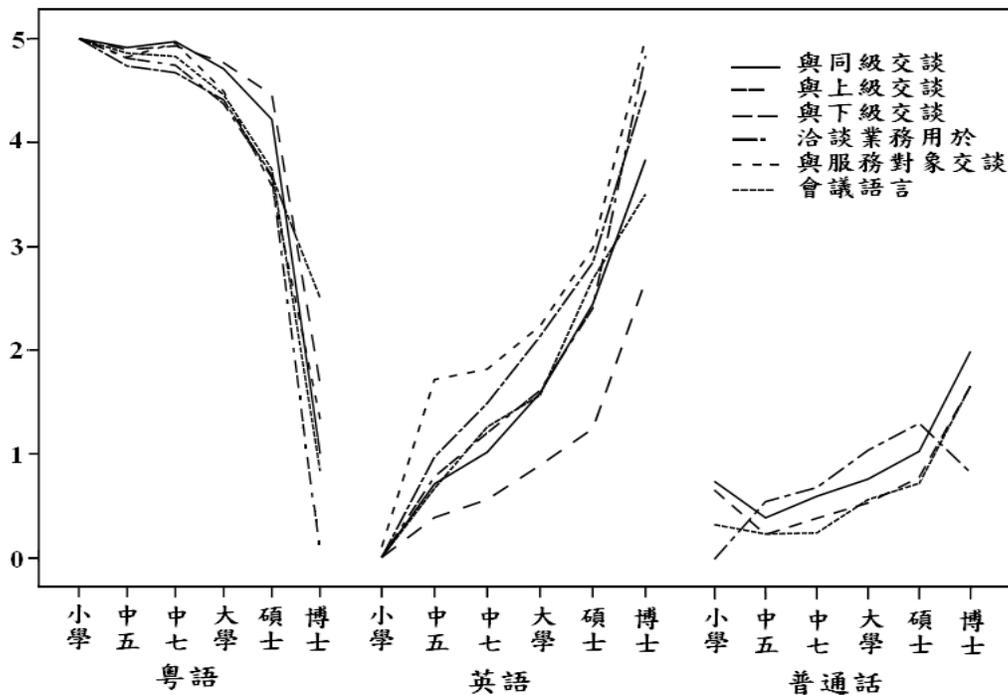


圖 3：受教育程度影響顯著的變項

從圖 3 可見，教育程度的高低與工作場所中三語的使用呈現相當穩定和明確的趨向。其中最容易發現的特徵是，粵語與英語的使用有背馳的情況。也就是說，教育程度愈高，在工作場所中使用粵語的機會便愈少；相反，教育程度愈高，使用英語的情況卻會增多。

大體而言，普通話與粵語的使用同樣有這種背馳的現象。箇中的分別在於，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愈高，他們使用英語的機會不但會增多，甚至連使用的均值亦有實質性的提高。這些受訪者使用英語的均值絕大多數情況下會高於 3（即一般情況下使用者），甚至可以接近 4（較常使用者）和 5（最常使用者）。然而，普通話的使用均值卻僅僅介乎 0 至 2 之間，屬「從不使用」與「較不常使用」的範圍。

4.3 職業性質

與教育程度的情況相似，職業性質對三語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與同級交談、與上級交談、與下級交談、與其他機構或企業進行業務上的交往、與工作服務對象交談及進行單位小組會議等六種場合中。以下先列出職業性質對各種工作場合中三語使用的顯著性數據：

表 6：職業性質對各變項的顯著性影響

		平方和	df	均方	F	顯著性
同僚粵語	組間	38.419	2	19.210	17.795	.000
	組內	1067.636	989	1.080		
同僚英語	組間	213.941	2	106.971	37.505	.000
	組內	2820.760	989	2.852		
同僚普通話	組間	33.724	2	16.862	11.538	.000
	組內	1445.336	989	1.461		
上級粵語	組間	128.150	2	64.075	33.928	.000
	組內	1830.043	969	1.889		
上級英語	組間	256.148	2	128.074	39.618	.000
	組內	3132.478	969	3.233		
上級普通話*	組間	5.758	2	2.879	2.769	.063
	組內	1007.587	969	1.040		
下級粵語	組間	24.777	2	12.388	12.192	.000
	組內	805.761	793	1.016		
下級英語	組間	59.707	2	29.853	15.789	.000
	組內	1499.349	793	1.891		
下級普通話	組間	32.769	2	16.384	14.291	.000
	組內	909.155	793	1.146		
業務粵語	組間	28.333	2	14.167	6.512	.002
	組內	1479.251	680	2.175		
業務英語	組間	182.746	2	91.373	24.885	.000
	組內	2496.841	680	3.672		
業務普通話	組間	47.827	2	23.914	11.114	.000
	組內	1463.130	680	2.152		
服務對象粵語	組間	65.883	2	32.942	22.782	.000
	組內	1367.860	946	1.446		
服務對象英語	組間	66.188	2	33.094	9.249	.000
	組內	3384.760	946	3.578		

服務對象普通話*	組間	1.065	2	.533	.175	.840
	組內	2881.095	946	3.046		
會議粵語	組間	58.063	2	29.032	15.511	.000
	組內	1645.202	879	1.872		
會議英語	組間	200.158	2	100.079	30.697	.000
	組內	2865.730	879	3.260		
會議普通話	組間	28.208	2	14.104	13.143	.000
	組內	943.297	879	1.073		

*：受職業性質因數影響的顯著性大於 0.05 者

表 6 各項目的顯著性絕大部分接近 0，只有「上級普通話」和「服務對象普通話」的數值高於 0.05，與上節教育程度的統計結果相同。

至於職業性質到底對這些項目中有哪些影響，或者是這些影響究竟呈現出哪些趨勢或型態，可以參看下面的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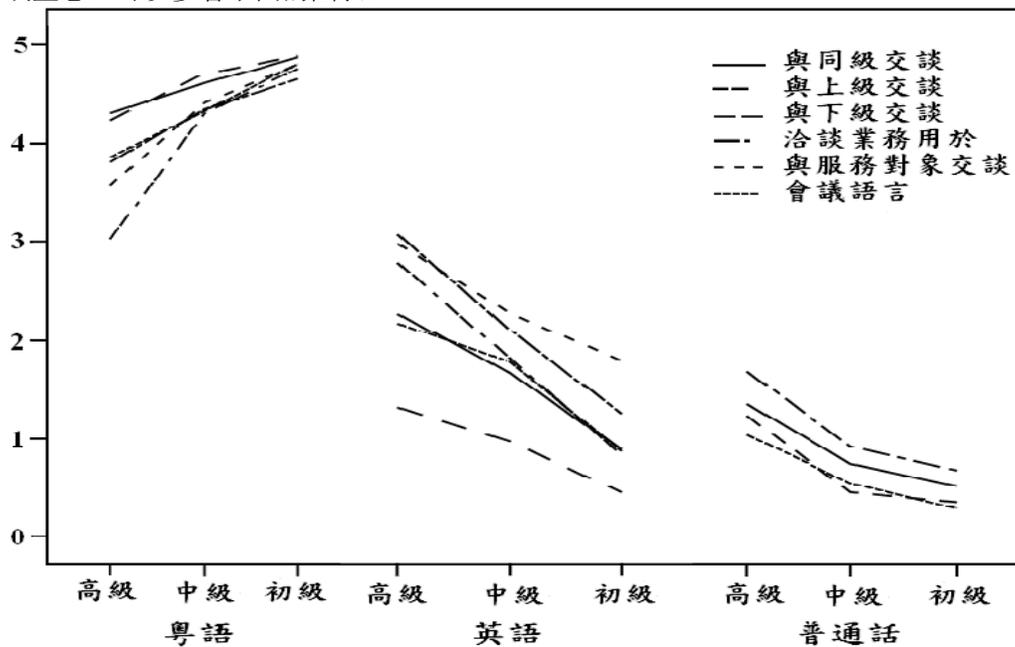


圖 4：受職級影響顯著的變項

圖 4 顯示，職位愈高或者職業性質愈是專門的受訪者，使用粵語的機會亦愈少，但他們運用英語和普通話機會卻愈多。這種背馳的現象似曾相識，與教育程度對三語運用的影響幾乎如出一轍。

不過必須留意的是，教育程度雖對粵語和英語有顯者的影響，但兩種語言的使用均值都橫跨 0 至 5 分，只有普通話在 0 至 2 之間。至於職業性質和職位高低雖同樣對粵語的使用有所影響，但粵語的均值最高為 5，最低亦有 3，介乎「一般情況下使用」至「最常使用」的語言。反觀英語的均值为 0 至 3，屬「從不使用」至「一般情況下使用」的語言，而普通話的均值則更低，只有 0 至 2 左右，乃「從不使用」至「較不常使用」的語言。

這些資料無疑可以加深我們對香港三語情況的瞭解，有助我們思考香港語文政策和語文教育方面的問題。

五 討論與結論

5.1 高低語言(diglossia)的迷思

談及香港三語使用的問題時，不少人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高低語言(diglossia)的思維套語，認為香港社會有用於正式場合、地位較高的高語言(high language)，同時又有用於非正式或私人場合的低語言 (Wardhaugh, 2009: 85-87)。譬如曾有學者預期，香港回歸以後，普通話會成為政治和行政管理的語言，英語則是科學技術、金融商貿的語言，而粵語只是家庭和熟人間或非正式交際場合中才會使用的語言（黃谷甘，1997）。這種說法隱含一個常見的假設，即粵語這種方言只是香港通俗的低語言，普通話和英語才是正式場合的高語言，因此主權回歸以後，官方政治層面自然會用民族共同語普通話，而金融科技的領域則用世界通行的英語。

然而事實證明，這類高低語言的設想與現實有很大的距離，香港三語的運用並沒有依循這種「規範」的發展方向。正如圖 1 所顯示，粵語的使用範圍絕不限於非正式場合，恰恰相反，它在工作場合中屬使用頻率最高的語言，所得均值達 4.60，遠比英語的 1.34 和普通話的 0.66 為高。

當然，把粵語視為低語言亦非毫無緣故。圖 3 和圖 4 便說明，教育程度越高、職業性質越是專業或越是高級的行政人員，在工作場合中使用粵語的均值亦會越低，這種背馳的現象難免令人覺得粵語在正式的場合中沒有顯著的地位。加上在殖民地時期，中文的地位不及英語，如鄒嘉彥在 1977 年做過一次調查，發現高收入人士在工作環境中，英語的使用遠遠超過粵語，而在家庭環境裏，粵語雖然雖高，但比起英語的差別也不太多（鄒、游 2007: 298-303）。這些說法都強化了粵語是低語言的印象。

不過必須補充的是，就算把教育程度與職業性質等影響項目加起來一併考慮，粵語亦不可能是低語言。假如把圖 3、圖 4 的資料重新整理，只列出工作場合中三語使用的均值，並把它們置於同一座標下，可以得出以下兩個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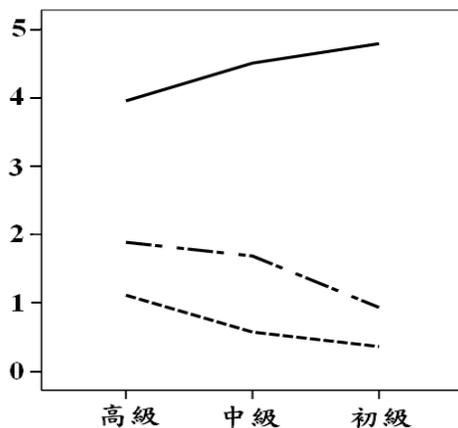


圖 5：教育程度影響下三語的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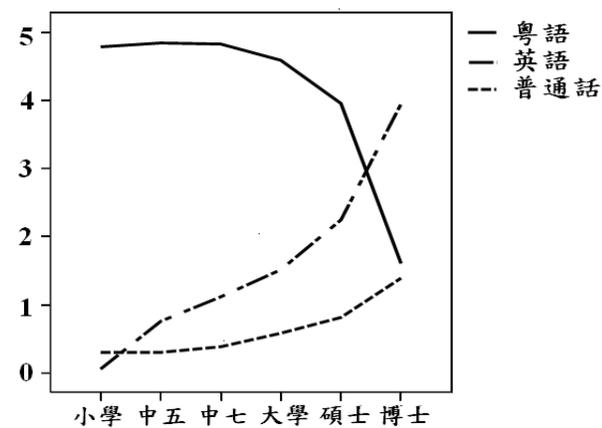


圖 6：職級影響下三語的走向

圖 5 顯示有大學學歷的受訪者使用粵語的均值也在 4 之上，屬較常用的語言，英語則要到碩士以上的程度，其均值始能超越粵語，而普通話的均值更從未高於粵語。職級方面，雖然越是專業、越是高級的人員使用粵語的機會越少，但從圖 6 可見，粵語最低的使用均值仍接近 4，而英語與普通話最高的均值卻分別只有 2 和 1。這些數據足以表明，縱使有前述的背馳情況，粵語在工作場合中仍然是非常通行的語言。因此若說回歸以後的香港「英語仍然是高層語言」，「粵語的使用範疇最廣，但語言地位低於英語」（《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課題組 2006），恐怕未能準確道出香港語言使用的實況。

5.2 語文政策與教育的啟示

筆者曾經呼籲，政府在制訂語文方面的政策時，也應像制訂經濟或交通等政策一樣，須要掌握相關的數據，對語言使用的實況有足夠的認識（李貴生，2006）。現在本文已列出一些調查結果，並作出初步的分析，然則這些資料對語文政策和語文教育方面的討論，又有甚麼幫助？以下我們試從社會、教育和課程等幾個層面入手，看看這些資料給予我們的啟示。

5.2.1 社會層面的語言認同與支援

語言不單是溝通的工具，同時也是階層和身份的表現，所以不同階層的語言層化變異和「階級方言口音」等問題，過去一直引起社會語言學者的注意（戴慶廈，2004: 49-50）。粵語既然是香港的工作與非工作場合中最常使用的語言，所以不諳粵語的少數族裔以至從內地來港的新移民，若要融入本地生活，首先會遇到語言方面的障礙。

有法律學者曾指出，「內地新移民由於其特定的語言和行為習慣，經常受到歧視，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顧敏康，2006）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消極的角度出發，儘力維護這些少數族裔和大陸同胞的基本權益，如有團體曾向政府爭取，希望歧視條例不要「忽視一些新移民或少數族裔因不諳本地廣東話而受歧視的問題，例如：沒有在醫院為少數族裔人士設翻譯等」（立法會，2007）。

然而粵語無論如何是本地的強勢語言，從長遠的角度看，公營機構的翻譯服務，最多只能為少數族裔人士和內地新移民提供基本的市民權益，並不能真正幫助他們融入香港社會。因此要提高香港市民對他們的身份認同，以及讓他們更有效地融入香港的日常生活，有關當局是否應該考慮提供社會層面的語言支援？現在我們提倡職業英語、職業普通話，但根據前文的調查，除了碩士以上的受訪較少機會使用粵語外，其餘大部分人在工作場合都要經常使用粵語，就算是行政管理或專業人士亦不例外。除非我們相信少數族裔人士和內地新移民都會擁有高學歷，進入高級行政的階層，否則正規的粵語教育實在有存在的價值，不容忽視。

5.2.2 教育層面的語文教學政策

不知是否受到高低語言觀念的影響，本地的基礎教育一向較為強調英語和普通話能力的提升，很少認真考慮粵語表達的問題。回歸後，香港雖然一度提倡母語教學，即以粵語作為教學語言，但粵語在這種政策中只是教學的手段，旨在傳達相關的學科

知識，粵語本身的能力發展並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不過根據上一節所言，語言能夠體現身份的認同，有助社會的融合，然則尚在求學階段的少數族裔和新來港學童，是否也應該系統地學習粵語，以便進入主流學校，融入本地的世界？至於本港出生的學生，既然他們將來的工作主要用粵語溝通，是否更應學好這種語言？這些問題牽連甚廣，實在不容易解答。

要明白上述問題的複雜之處，首先要知道基礎教育的語文教學有兩個不盡相同的目的。它一方面要為社會育才，為學生未來的就業做準備，但另一方面，它也肩負語文規範的責任，有義務塑造未來的語言生態。若從學生的就業前景看，既然粵語是工作場所中最常用的語言，正視系統的粵語學習自是理所當然的事，但若從語言規範的角度看，過多的方言學習也許會妨礙民族共同語（普通話）或國際語言（英語）的推廣，亦未必符合香港長遠利益或政策方向。

正是由於社會及教育界人士對這兩個教育目的有不盡相同的理解和偏重，近幾年基礎教育中的教學語言和語文教學方面問題，如中文中學標籤效應、上落車機制、微調方案，以至聘任外籍英語教師和用普通話教中文等，動輒會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這些問題也許不能在短期內有確切的答案，但若要在社會上營造共識，我們必須要瞭解本港的實況，始能有討論的餘地。

根據我們的調查，粵語在工作與非工作場所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要全面規劃本港的語文教學政策，我們必須要正視粵語使用的實況，以及它在三語中的位置。否則的話，我們制訂的政策很容易會脫離社會的現實基礎，不但不能貫徹落實，而且會引起很大的爭論。

5.2.3 課程層面的內容選材問題

最後要指出的是，除了社會與語文教育等大的決策方向外，語言調查的數據對三語教學的內容選材，也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只要我們懂得恰當運用，三語在工作與非工作中不同場合的使用頻度，都可以是非常有用的資料。

先說工作場合，從表 3 可見，英語和普通話在與服務對象和業務對象交談的場合中，使用的均值較其他項目為高。因此若要針對學員的實際需要，我們自應儘量選擇這兩種場合中的語言素材，強化有關的語言訓練。此外，在與上級和同級交談時，受訪者使用英語的均值明顯比與下級交談的均值為高，所以若要設計貼近生活的教材，我們摹擬的處境亦可以配合調查的成果，多介紹與上級和同級交談的語體。當然，粵語在各種場合的使用均值都極高，我們的選材亦要相應地更多元化，為學生投身職場做好足夠的準備。

至於非工作場合方面，表面看來似乎與教學的選材沒有特別的關係，因為基礎教育或語言支援的課程，並沒有必要照顧學員在私人或非正式場合中的語言使用情況。不過細看表 3 的有關數據，可以發現受訪者在觀看電視、收聽電台廣播與從事文娛康樂活動時，都會經常接觸英語和普通話。這些場合雖然與工作場所沒有直接關係，但若善加利用，在教材中加入這些元素，或通過這些媒體傳達內容，相信定能增加學員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習的效能。

當然，與服務對象、業務對象交談，或與上級、同級交談的內容素材，很可能會因不同的職業而有所變化。因此若要更為準確地針對真實的處境，設計合適的教材，理應把工作的種類納入考慮的範圍。其實我們的調查亦已涵蓋了這些資料，只是由於

職業的種類較多，影響因素亦較複雜，只能留待另文再作討論。不過無論如何，這些調查資料能夠有助我們選擇合適的教學內容，這一點卻是毋庸置疑的。

參考文獻：

- 《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課題組. 2006. 《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北京：商務印書館。
- 尹海潔、劉耳. 2008. 《社會統計軟體 SPSS 15.0 for Windows 簡明教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李貴生. 2006. 〈香港粵語的定位與教學語言問題〉，廈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主辦：「兩岸四地語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 李貴生、梁慧敏. 2010. 〈語言調查與語文政策〉，《星島日報》，2010年3月15日，〈教育評論〉，F3版。
- 李貴生、梁慧敏. 2009. 〈三語政策下粵語的定位問題〉，《星島日報》，2009年7月10日，〈師家版·教育評論〉，F4版。
- 余民寧. 2005. 《心理與教育統計學》。臺北：三民書局。
-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06. 「二零零六年中期中口統計」 (www.byccensus2006.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981/a106c.xls)。瀏覽日期：2009年11月7日。
- 香港政府立法會. 2007. 「CB(2)1226/06-07(02)號文件(修訂本)」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bc/bc52/papers/bc520303cb2-1226-2-c.pdf>)。瀏覽日期：2009年11月29日。
- 黃谷甘. 1997. 〈「九七」回歸與香港語文芻議〉，《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頁88-91。
- 鄒嘉彥、游汝傑. 2007. 《社會語言學教程》。臺北：五南圖書。
- 戴慶夏. 2004. 《社會語言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 顧敏康. 2006. 「種族歧視條例應涵蓋內地新移民」，《明報》論壇，2006年12月14日，A32。
- Wardhaugh, Ronald. 2009.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Chichester, West Sussex, U.K. ; Malden, MA : Wiley-Blackwell.

A Preliminary Survey on the Use of Spoken Languages in Hong Kong's Workplace

LEE Kwai-Sang & LEUNG Wai-Mu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ctual language use in Hong Kong us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t describes the use of Cantonese, English and Putonghua in both non-workplace and workplace settings,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variables on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these three languages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Addressing the current language policy of Hong Kong,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oteworthy phenomena and problems and explains that social surveys are the key to efficient and reasonable language planning in education.

Keywords Hong Kong, Cantonese, English, Putonghua, language survey